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接下来的党面临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

怎么搞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经验。

我们先是走的一条照抄照搬的路。

建国初期为什么要照搬苏联模式？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长期敌视中国，而苏联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10月3号，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2. 中国缺少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需要学习，而苏联在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实力和工业化中的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优越性。

毛泽东：“苏联共产党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一个国家无论考虑什么问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资料：

一、毛泽东面对的国内环境

毛泽东认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认清中国的国情。

第一，新中国的发展基础是“一穷二白”，非常薄弱。在经济上，农村1.2亿亩土地受灾、4000万灾民饥寒交迫，城市有400万失业人员，国民党政府留下了数百万的军政人员；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出现4次大规模涨价风，上海批发物价涨了20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电量落后40年，钢产量落后70年，石油产量落后100多年，农业落后70多年；铁路还不及印度的一半，401台拖拉机还不及印度7500台的零头。在政治方面，新解放区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有的还未巩固；地主、恶霸仍然横行乡里。在军事方面，全国尚未完全解放，10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200多万武装土匪、60多万反革命分子还在负隅顽抗。在思想文化方面，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全国有的少数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西藏则是农奴制社会。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预言：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些就是毛泽东等新中国的主人们继承的遗产，就是新中国无法回避的起点！

第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占了极小的比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作为经济发展关键的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只有1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5%，若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重工业产值21.2元（当时约合8美元左右）。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极为落后，重要生产部门短缺，难以形成基本的生产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第三，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相当落后。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所谓的

先进科学技术，没有。进而影响到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等一系列环节，这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根据列宁的观点，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上述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估计：“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

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急于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的状态。

二、国际环境

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似乎永远脱不开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成为两大阵营，而且是对峙的局面。一方面，美苏两个大国主宰国际事务，促使毛泽东形成了反抗的情绪（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先是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形势相当严峻。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企图扼杀新中国。他们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禁运；在军事上先是战争挑畔，后是核威胁，继而组织反华军事同盟，形成对中国的半月形军事包围圈。另外，还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以至战争威胁对我党和人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我们更感到加快工业化建设以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必要。那个年代，中国还面对着苏联的威胁。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是要求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和海军基地，遭拒后撤走全部专家，停止对华援助，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二是在新疆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制造反革命暴乱，引诱、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跑到苏境。三是公开宣称中国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四是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五是公开向我珍宝岛发动军事进攻，并试图袭击我国核基地。六是试图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对付中国。七是支持印度向我挑衅。这样，“毛泽东时代”始终笼罩于战争乌云之下，直接影响到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项建设不得不立足于战争，难以更多改善人民生活。）。

正如1958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讲：“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有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无时不希望颠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我们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能认为有充分的保证。同时，从国内情况来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又穷又白’的大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很薄弱的，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就不能认为是巩固的。”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不但冲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观念，也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

经济上：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忽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挖得很苦”，农民利益牺牲很大，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把地方管得太死，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民族关系上，存在严重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

政治上：缺乏民主破坏法制。

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形成个人专断。

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正是在这个国际国内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背景：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这篇著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之际，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这个探索，是从准备党的八大文件，进行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开始的。1955年12月，刘少奇为主持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政治报告，约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得知后，也要求听取一些部门的工作汇报。于是，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从4月下旬起，毛泽东又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另外，还看了许多大工厂的书面汇报。

十大关系是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逐渐归纳概括出来的。第一阶段的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三大关系。第二阶段汇报结束时，又归纳出三大关系，即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不久，又提出了其他四个方面的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连续讨论了3天。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毛泽东进行修改补充，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

《论十大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作过传达。1965年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这次整理稿，以1956年5月2日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4月25日讲话记录稿中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看了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胡乔木具体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记录稿重新整理，形成了一个新的整理稿，恢复了以前删去的重要内容。7月1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经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99年6月，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所分析的十大关系，或者说十个问题，都是在借鉴苏联教训、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五大关系主要讲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后五大关系主要讲政治等问题，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还提出，“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关于中国和外国关系，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论述，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系统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遗憾的是，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势头没有能够保持下去，八大前后取得的很多积极成果在1957年后遭到了背弃。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

习近平2013年6月2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谈《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寻找正确道路中也历经艰辛。一开始，因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只能照搬苏联模式，一边倒，走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路子。后来，我们党认识到这种做法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思考，取得了一些成果，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等就反映了这个探索的成果。

如何落实？——做到“三个必须”

一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

提出背景：

1. 国际：斯大林认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也消失殆尽，苏联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应，不存在任何矛盾。认为精神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不顾基本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的波兰，经济一直萎靡，人们的生活一直无法提高引起了波兰人民的不满。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政府为其增减工资的情愿未能成功，因此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导致该厂的工人进行游行示威，也因此引起波兹南枪战，造成人民死伤。7月，波兰政府宣布分期偿还征收工人们的超额税收，至此矛盾得以解决。匈牙利人民政权建立后，照办苏联模式，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近20万名大学生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击者推到了市内的斯要求政府实行工人自治及撤走苏军。当时的新政府请求苏联军队来协助恢复秩序。这一行动更加激怒了群众，导致部分学生、工人、士兵同苏军的武装冲突，苏军在镇压动乱中，枪杀了许多无辜群众。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触动是很深的。

波匈事件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两个：其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逐步形成了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二，毛泽东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中，感受到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虽然一方面又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在继续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这就更加坚定了他与之斗争的信念，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2. 国内：在国内，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完成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党在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状况。一些城市出现粮食和日用品供应短缺，一些农村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一些学生、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等方面遇到困难，

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1956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罢课、退社和请愿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广东农村先后有10多万户农民退社。

面对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如何从理论上正确加以总结和概括，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也日益成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于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指出：国内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解决，对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新问题，研究它是一种科学，等等。同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文章发表后，在西方国家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并发表社论。美国、欧洲、亚洲等其他许多国家的重要报纸都刊载了这篇文章的消息或内容摘要。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等问题，主要包括：

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3. 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此，党中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求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党要学科学、学技术、学新本领。

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矛盾，这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包括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5. 毛泽东论述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他指出：敌我

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所谓专政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于国家内部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治罪，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尽量使他们改造成成为新人。所谓民主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总方针。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实践中的不同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原则：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讨论的方法；对于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对于人民群众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努力克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也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对于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艺术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实行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方针，都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方针的具体化，为解决不同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7. 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意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8. 毛泽东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

建国初期工业现状：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全国重工业产值只有12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5.5%，若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重工业产值21.2元（当时约合8美元左右）。特别是重工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极为落后，重要生产部门短缺，难以形成基本的生产体系。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建国初期仿苏模式的工业化及其弊端，“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但过度强调重工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比例失调。《论十大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以及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等。这是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强调农、轻、重比例协调。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

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党的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毛泽东多次阐述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既要顾全大局，突出重点，也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同时，也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开展与外国的经济交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外国的长处和好的经验，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强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作用。一是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钱学森回国：当1949年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先生就开始和妻子商量一起回祖国效力。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发表声明“无论钱学森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因此他受到了美方的监视与迫害。周恩来通过外交谈判积极斡旋，用美国战俘换来了钱学森的返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第二节 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初步探索的意义

1. 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建国后，我们举全国之力去搞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注意农、轻、重比例协调，基本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观看视频：《旗帜》第4集艰辛探索（片段）

问题：我们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的？

案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哪些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曲折，但是成绩斐然。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快速的。在此期间，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成就。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伊始，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编制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此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这一时期，在钢铁工业方面，陆续建成鞍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包头钢铁厂、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

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设完成了大庆油田，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来开会就好了。”一汽经过努力生产出了“东风轿车”。后一汽确立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奋战33天生产出了红旗轿车。

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时期，为保证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国依靠人民集体力量修建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比如新安江水库、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等，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用电，又相继建立了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等大中型水电站。

同时，交通运输业也得以大发展，成渝、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黔桂、成昆等线建成通车。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火车。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十多个万吨深水泊位，远洋航运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

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科研攻关并取得重大突破。196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国先后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射成功。

在基础科学研究上，1965年我国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生命。1973年，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在我国培育成功，为水稻大幅增产开辟了新的途径，它的应用被称为“新的绿色革命”。

科技战线上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成就，不仅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战略防御能力，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培育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与伟大时代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快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反对封建迷信、扫除文盲、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精神力量上也获得了巨大丰收。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迎来新发展。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如小说《青春之歌》

《创业史》，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江姐》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经典之作。

这一时期，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成为时代的楷模。以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茅以升、邓稼先、郭永怀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还有参加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地质勘探、石油勘探和三线建设的许多干部、职工、科学技术人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戈壁荒滩，在崇山峻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奏响了无私奉献的时代最强音。这些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形成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精神。

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案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的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为我们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开拓了可以依靠的阵地，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随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部门不仅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批燃料、动力、原材料和技术装备，而且还为出口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产品，它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汲取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了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二、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遭受过重大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

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践证明这个论断非常正确。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和对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缺乏正确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根本性错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论断，毛泽东同志非常想发展生产力，想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但试图以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政权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愿望是好的，效果不好。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直接造成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犯的一个较严重错误，是值得后人深刻吸取的教训。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认识] 要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客观认识甲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只有认清国情，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一穷二白、社会化程度非常低、农业人口众多，在这样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长时间地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我国自1958年开始，由于指导思想“左”的错误日益发展，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实际可能性，急于求成，提出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超英赶美”的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急于求成”的高速度是欲速不达的。反而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我们党忽视法制建设。1958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行政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约束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能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刑法、民法来维持秩序，国务院、全国人大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刘少奇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基于领导人的这些理念的转变，八大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人治的复归，产生了党大于法，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的现象。后来形成的党内崇拜与民主法制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可以说是一项根本性建设，这是我们总结毛泽东同志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出的重要教训。

第五，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由于我们党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方式还自觉不自觉地带有革命时期的痕迹。那就是凸显领导权威，领导决策一切事务。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建设任务本身的繁重复杂，又加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客观上要求党实施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出现的决策失误。因此必须实行长久的稳定的领导体制，而不能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一两个领导人身上。但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全党

和全国弥漫着个人崇拜气氛，导致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能得到全党的有力抵制，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因此，实施集体领导制度是党决策正确的有效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实施集体领导，防止出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第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本章小结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形成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重要思想。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发展。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思考题

1.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2. 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大意义？
3.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有哪些经验教训？